

中国马克思主义

ZHONGGUO MAKESI
ZHUYI SHEHUI FAZHAN
LILUN YANJIU

社会发展理论研究

尹保华 / 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研究

尹保华 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研究/尹保华著.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8. 1
ISBN 978-7-5130-5230-6

I. ①中… II. ①尹… III. ①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研究—中国 IV. ①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59965 号

内容提要

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蕴含众多理论主题, 本书选取社会发展理念、社会发展战略、社会发展动力、社会发展公平正义、社会发展代价和社会发展的全球化这六个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时代特征比较突出的理论主题, 展开系统论述, 尤其重点论述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创新。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牢牢站在当代中国乃至全球社会发展实践这个坚实的基础之上, 以大无畏的理论创新的胆识与气魄, 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中国议题, 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思想宝库不断增添着中国智慧, 使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飞跃到新境界和新高度, 不仅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思想作出了卓越的理论贡献, 同时也为整个人类社会发展思想作出了巨大贡献。

责任编辑: 石红华

责任校对: 王 岩

封面设计: 刘 伟

责任出版: 刘译文

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研究

尹保华 著

出版发行: 知识产权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网 址: <http://www.ipph.cn>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气象路50号院 邮 编: 100081

责编电话: 010-82000860 转 8130 责编邮箱: shihonghua@sina.com

发行电话: 010-82000860 转 8101/8102 发行传真: 010-82000893/82005070/82000270

印 刷: 三河市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大网上书店、新华书店及相关专业书店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1

版 次: 2018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字 数: 344千字

定 价: 58.00元

ISBN 978-7-5130-5230-6

出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前 言

现代社会的发展进程中日益凸显社会发展理论的重要价值，以至“发展理论”成为哲学以及众多社会科学研究的一大热点。综观国内外研究，各种关于发展的学说竞相登场，流派纷呈，许多观点极具启发价值和借鉴意义。然而，就发展研究的现状来看，较多的还是西方发展理论的话语，尤其是面对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西方发展理论的译介和传播虽然很有价值，但其理论实质与发展中国的实际存在不同程度的错位，所以很难用来指导具体的实践。正如丰子义教授指出的，西方发展理论不可能真正站在非西方立场上来研究问题；西方发展理论所提出的问题也不完全是发展中国家真正存在的和需要解决的问题；西方发展理论不足以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① 总之，西方发展理论不能作为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的指南，尤其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现实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且不说众多，随便拿出任何一个具体领域的问题，都是“天字第一号”且极其复杂。同时，这些问题之间有时相互交织，可谓纵横交错，其复杂程度令人难以想象，其他任何国家都不足以比拟。因此，中国自己的事情只有自己才最有发言权，发展中的问题也只能主要依靠自身的力量来解决，阐释中国发展实践的责任自然也就落在中国自己的“思想者”肩上。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② 历史上的每一次重大发展、每一次深刻的社会变革，往往都会引发人们对社会发展认识的深刻变化，进而促发理论层面的重大创新。以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面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各种重大问题，真正发

① 丰子义：《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

挥了阐释中国发展实践的“思想者”的典范作用。他们立足于中国的实际，依据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基本原理、观点和方法，充分运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极其丰富的滋养性资源，深入思考分析中国社会发展（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加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两大历史时期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涌现的重大问题，并作出系统科学的理论回答，形成真正中国意义上的理论形态，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引导着中国社会发展这一史无前例的伟大实践不断迈向新台阶，并对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社会进步产生积极影响。

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内涵丰富，博大精深。不断深化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理性认识和理论阐释，对于进一步增强我们走“中国道路”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具有极其突出的理论价值和十分重大的实践意义。本书选取社会发展理念、社会发展战略、社会发展动力、社会发展公平正义、社会发展代价、社会发展的全球化这六个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时代特征比较突出的理论主题，展开系统论述，尤其是重点论述习近平同志的理论创新。为了说明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创新性成果，对本书所列每个理论主题大都是首先铺垫一些基本概念和基础理论，或者是比较系统地梳理经典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相关论述，然后在此基础上展开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各理论主题的论述，并且每个理论主题大都是采用“三段论”的策略展开论述，即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众所周知，作为一个开放的体系，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有其自身的逻辑运行规律，即一脉相承、与时俱进、不断飞跃。以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等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正是牢牢站在中国的发展实践乃至全球发展的实践这个坚实的基础之上，以大无畏的理论创新的胆识与气魄，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中国议题，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思想宝库不断增添着中国智慧，使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飞跃到新境界和新高度，不仅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思想作出了卓越的理论贡献，同时也为整个人类社会发展思想作出了巨大贡献。

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所涉问题和领域十分广泛，可以说其理论议题涉及人类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同样，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亦然包含众多理论主题。鉴于作者自身研究水平的局限以及时间精力等的限

制，本书只是选取其中的若干理论主题进行相对深入的论述，其他的众多理论主题只能留待后续研究的开展。当然，我们也知道，对于这么重大和复杂的理论领域展开研究，仅仅靠某个人或少数人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因此笔者热切期盼学界同人共同努力，更加系统、全面和深入地阐释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这个人类社会发展极其宝贵的思想资源，以贡献于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与持续进步，进而促进人类社会向着更加美好的未来不断前行。

目 录

社会发展理念理论 // 1

- 一、理念与发展理念 // 3
- 二、发展概念的多维诠释 // 4
- 三、发展理念的演进过程 // 22
- 四、中国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发展理念的探索 // 28

社会发展战略理论 // 63

- 一、社会发展战略释义 // 65
- 二、毛泽东的社会发展战略思想 // 70
- 三、邓小平的社会发展战略思想 // 86
- 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新的历史条件下治国理政总方略 // 93

社会发展动力理论 // 105

- 一、引言 // 107
- 二、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理论的直接理论基础 // 111
- 三、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理论的创新 // 124

社会发展公平正义理论 // 177

- 一、引论 // 179
- 二、公平正义的概念释义 // 181
- 三、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发展公平正义思想 // 188
- 四、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公平正义思想 // 192

社会发展代价理论 // 235

- 一、代价与社会发展代价 // 237
- 二、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代价理论 // 246
- 三、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代价理论的创新 // 260

社会发展的全球化理论 // 273

- 一、引论 // 275
- 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世界历史”理论 // 280
- 三、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全球化理论 // 302

后 记 // 327



社会发展理念理论

一、理念与发展理念

理念，《辞海》中是这样解释的：旧哲学名词。柏拉图哲学中的“观念”通常被译为理念，康德、黑格尔等人的哲学中的“观念”是指理性领域内的概念，有时也译作“理念”。具体而言，《辞海》对“理念”一词的解释有两条，一是“看法、思想。思维活动的结果”，二是“观念（希腊文 idea）。通常指思想。有时亦指表象或客观事物在人脑里留下的概括的形象”。^①因此，理念其实是经过人类的思维活动，对所认识的对象进行信息内容的加工，即通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过程，所形成的关于认识对象本质意义上的观念、思想、看法等，体现为人类思维活动的结果及概念或法则等。

所谓发展理念，作为思维活动的结果及概念形态，无疑是人们对于发展这一认识对象所持有的本质意义上观念、思想或看法。简明而言，发展理念就是人们所持有的关于发展的本质意义上的观念。因此，发展理念也可以叫作发展观。发展理念是发展实践的反映，是对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和怎样发展的理性回答所形成的基本观点和系统性认识。发展理念决定以及引领发展目的与宗旨、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发展战略、发展方式、发展动力、发展机遇等一系列发展的基本问题。从现代国家和政党实践的经验看，发展观或发展理念是现代国家或政府以及执政党执政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子义认为，发展理念主要是对发展本质与意义的最基本的认识和体悟。一定的发展理念是与其相应的整个发展理论的内核所在，它支撑和影响某种发展理论的形成和建构，同时又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发展实践。因为一种发展理念反映了一种时代精神、实践理性和价值取向，它引导着一个国家、民族的发展潮流，对社会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从历史上来看，欧洲中世纪的神学发展理念曾经使整个社会生活置于封建蒙昧状态，因而导致上千年的社会发展缓慢；近代以来理性观念的确立和弘扬，则创建了一种新的文明，使社会生活充满了生机与活力，欧洲社会由此迈入现代化行列。发展理念作为对发展实践的一种理解与反映，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的。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历史

① 夏征农主编：《辞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1367页。

阶段，有着不同的发展理念。如现在人们都在讲发展，实际上发展的内涵已经在潜移默化地发生变化。改革开放以来所讲的发展远不同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发展，今天所讲的发展也不同于改革开放初期的发展。尤其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提出，发展已经有了更为全面的新的内涵，这在发展的方针、政策和发展战略上均有具体的体现；在发展的各种指数和参照标准上都有明显的反映。自觉把握发展观上的这些变化，对于形成新的发展理念并用以引导发展，无疑是重要的一环。因此，研究发展，不能仅仅满足于具体对策的研究，同时必须对发展理念予以高度关注。增强理论自觉，最根本的是树立明确的发展理念。要树立正确的发展观，有必要对发展本身加以理论上的严格审视和深层次把握，尤其是需要一种哲学理解方式，以达到总体性的、一般性的思考和把握。^①

二、发展概念的多维诠释

“发展”概念人人皆知，且被高频率地使用于多种场合，似乎发展是众所周知、无须辨明的，其实不然。从现实情况来看，人们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领域和不同的层次上对“发展”的理解和运用，不仅是不同的，而且有时是混乱的。^②从多学科研究的角度讲，“发展”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其内涵既不是一成不变的，又是多元共存的。古代人们认识到发展是一种运动、变化（比如亚里士多德），近代人们又赋予发展是一种进步，即发展的方向是前进、上升（比如进化论）。人们对发展内涵的理解不仅是不断变化、深化、丰富的，而且在不断赋予发展新内涵的过程中演绎出一般发展或广义的发展概念，以及社会发展或狭义的发展概念。发展作为哲学意义上的概念，当代发展哲学对其内涵的解读日趋丰富与深化，形成对发展概念的总体的、一般的、系统的理论认识成果。

（一）发展概念的历史演进

1. 古代意义上的“发展”概念

在古代，虽然没有“发展”一词，但并不能说没有发展的认识或思

① 丰子义：《发展实践呼唤新的发展理念》，《学术研究》，2003年第11期，第24页。

② 叶泽雄：《当代社会发展观导论》，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页。

想。中国古代哲学已经具有朴素的变易观念，如《易传》说“革去故鼎取新”；《韩非子》说“古今异俗，新故易备”；《公羊传》提出“三世”异变观；《淮南子》和张衡所著《灵宪》提出宇宙生成论；柳宗元认为由榛狁而封建而郡县是历史变化发展趋势的思想；王安石说“新故相除者，天也”；王夫之提出“洪荒无揖让之道，唐、虞无吊伐之道，汉、唐无今之道，则今日无他年之道”的“道”随“器”变的观点等。所有这些，都是承认变化发展的哲学观念。^① 在古希腊时期，“发展”大致与运动、变化同义。古希腊的一些哲学家就是在运动、变化意义上谈论“发展”问题的。比如，被称为欧洲哲学史上“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② 的赫拉克利特，提出了“一切皆流，无物常驻”的著名命题。在他看来，既然作为本原的“火”是永恒变动的，那么由“火”所生成的万物也处在不停的运动变化之中。他认为一切都像河水一样，川流不息，永远处于变动的过程中，“我们不能两次走下同一条河流”，“我们踏进又踏不进同一条河流，我们存在又不存在”。他根据对自然界的观察，用大量生动的事例描绘了宇宙万物的流变图，这样，呈现在人们面前的物质世界，再也不是静止的事物的总和，而是一个不断运动、变化的过程。恩格斯把赫拉克利特的动变观称为“原始的、朴素的但实质上正确的世界观”。^③ 另外，赫拉克利特还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规律性的思想（他称为“逻各斯”），以及在一定程度上猜测到了对立统一的思想（他提出了“对立造成和谐”的命题）等。再如，在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看来，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是运动变化的，运动就是能运动物潜能的实现，一旦把这种能力实现出来，变成现实，就是运动。他把运动分为三类：一类是数量方面的运动，即数量的增加或减少；一类是性质方面的运动，即质变；还有一类是空间方面的运动，即位置的移动。发展就是属于数量、性质方面运动、变化的范畴。应当说，发展无疑是一种运动、变化，但不能反过来说运动、变化就是发展，尤其在社会历史领域内，发展绝不是一般的运动、变化所能涵盖的，它有着丰富而独特的内涵。

在中世纪，也存在所谓发展的思想，但此时的“发展”基本上是在神

① 参见杨雅彬：《近代中国社会学》（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② 《列宁全集》，第3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9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页。

学的框架下来理解和体现的。比如，经院哲学的著名代表、被当时的人们称作“天使博士”的托马斯·阿奎那的“五大证明”就是很好的例子。为了论证上帝的存在（因为他知道，上帝存在这条教义是基督教的基石），托马斯·阿奎那因袭了许多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并混合了阿拉伯哲学家的一些论点，提出了所谓关于上帝存在和创世的五大论证：不动的推动者的论证——这一论证方法主要是从事物的运动变化方面来论证上帝的存在；最终因的论证——从动力因的性质上来证明上帝的存在；自身必然性的论证——从可能和必然性来论证上帝的存在；真实的等级的论证——从事物发展的真实性的等级存在来论证上帝的存在；目的因的论证——从世界的秩序或目的性来论证上帝的存在。^① 总之，由于上帝是自然界和人间的造物主，因而世界万事万物的运动、发展莫不源于上帝。按照基督教的教义，人是生而有罪的，只有信奉上帝，接受末日审判，才能获得上帝的恩赐和救赎，重返千年王国。因此，所谓发展，不外是人自觉地反省自己的原罪，善于忍耐、节欲，以求上帝救赎的过程，是人通过努力力求抵达来世的彼岸的过程。这一过程无论就其发展目标、发展方式，还是就其发展动因、发展结局来说，都是预定的、无可更改的，人不过是执行上帝意旨的工具。

2. 近代意义上的“发展”概念

在西方，到了近代“发展”才开始真正走出神学的藩篱走向现实生活。随着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兴起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发展不仅成了时代的最强音，而且具有了新的内涵。发展不光是对宏观世界运动、变化的表达与描述，同时具有了进步的含义。发展就意味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知识的增长和人性的自由解放，人类进步成为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不过，限于当时思想文化条件的限制，对“发展”的理解基本上还是受传统进化论的影响，自然进化成为发展的进步含义。在传统进化论的视野里，发展与进化基本上是同义语。“进化”的概念来源于拉丁文“evolutio”，原意为“展开”，一般用以指事物的逐渐变化、发展，由一种状态过渡到另一种状态。生物进化论最先将此词用于生物学研究中，认为一切生命形态

^① 参见卜祥记、刘清华主编：《欧洲哲学史教程》，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7~169页。

都有其发生、发展的演变过程，生物最初就是从非生物发展过来的，现在生存的各种生物，有其共同的祖先，在进化过程中，通过变异、遗传和自然选择，生物逐渐由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种类由少到多。受生物进化论的影响，许多社会学家也用这种思维方式来解释社会发展，认为社会发展的过程在性质上与生物进化的过程是相同的，只不过更为复杂罢了。他们把社会发展看作一个趋向理想社会状态的进化过程，它表现为一种满足社会功能分化需要的结构分化，即人口的增长引起社会复合性的增加，社会复合性的增加又引起劳动分工的细密，从而导致社会从同质性向异质性、从强制性合作向自愿性合作、从军事组织向工业组织的发展，而这种发展所遵循的也是自由竞争、自然淘汰的法则。同时，近代的社会发展论基本上是套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发展、研究人类生活，在一些研究者的眼里，自然主义的公设是毋庸置疑的，人类社会在本质上与自然界是一样的，因此，也就可以用研究自然界的方法来研究人类社会。总之，在近代的许多思想家那里，进化论也就是发展论。譬如，英国实证主义哲学家、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就是其中的代表。斯宾塞的社会学理论主要有两个：一是社会有机论，一是社会进化论。

（1）社会有机论。社会有机论的核心是把社会看作一个统一的整体。在社会观上，斯宾塞认为，社会是一个实体，他不同意社会唯名论把社会比喻为大厅里听演讲的观众这样一个观点。因为这样的比喻暗示着当演讲一结束，听众走散，听众这个实体就不复存在（唯名论者以这样的例子来说明社会不是一个客观常在的实体，客观常在的实体是单个的人）。斯宾塞认为，社会中的人们与大厅里的人们的关系具有很大的不同，社会中的人们之间的关系是长期、牢固的。斯宾塞将实体划分为三类：无机体、有机体和超有机体。在这里，斯宾塞引入了生物有机体的概念，认为社会学应当像生物学一样，不能简单地从个体层面上考察社会现象，而应该把社会看作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应从整体角度上考察各部分之间的关系。斯宾塞认为，社会像生物有机体一样，都有生长、发育的过程。伴随这一过程，社会也会产生结构和功能分化。结构分化指伴随生长的过程，有机体自身结构的日益复杂化，即社会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差异性扩大。功能的分化则意味着各个结构的效用已无法相互替代，各有分工，相互依赖。“在简单社会中，没有分化意味着同一个人既是猎手又是战士；而一个结构复

杂的有差异的社会意味着各种角色和功能的专业化”^①。这里，斯宾塞就将生物学中的“功能系统”的概念引入社会，即依据功能划分内部的结构及其活动方式。他将社会划分为三个系统：营养（生产）系统，负责必需产品的生产；循环（分配）系统，负责社会各个部分在分工基础上的联系；神经（调节）系统，保证各个部分服从社会整体。其中，营养的功能由劳动阶级担负，分配功能由商人担负，调节功能则由工业资本家担负，这三者各有不同的功能，相互配合，缺一不可。同时，斯宾塞指出，社会有机体与生物有机体也存在本质的区别，社会有机体是分散的整体，而生物有机体是具体的整体。在生物有机体中，分子是为了整体而生存的，而在社会有机体中则相反。社会是个人的集合体，是为个人成长与幸福而存在的。在联系的模式上，社会有机体比生物有机体对符号有更大的依赖性。他还认为，与生物有机体相比，社会有机体是一种“超级有机体”，生物有机体是依靠物理和化学的作用维持其生长，而社会有机体则是依靠语言、文字、科学、艺术、思想系统来维持其正常生活和活动的。

（2）社会进化论。斯宾塞学说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社会进化论。斯宾塞认为，社会进化是不可抗拒的。因为进化是在“永恒的力”的作用下，不断推进的。永恒的力表现为“引力”和“斥力”两种作用方式。在事物发展初级阶段往往是均衡、同质的，主要受“斥力”支配。“斥力”推动事物不断地分化，即异质性增长。异质性事物受“引力”的支配使得各个部分联系起来，出现整合的过程，当引力与斥力平衡时，事物的分化和整合也趋于均衡。无论是生物进化还是社会进化，均是在“永恒的力”的作用下，遵循“同质性—分化—异质性—整合”的这样一个过程。这一过程在社会进化过程中表现为分化、异质性增长、凝聚、确定等多个进化环节，表现为社会有机体在适应变化的过程中，其内部的功能和结构所发生的由松散联系到异质性整合的过程。不同的社会在“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生物学家法则下，在这一过程中表现为不同的命运。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斯宾塞将人类的社会形态简单地划分为两种基本的形态：军事社会与工业社会。斯宾塞认为，军事社会最突出的特点是强制。他认为，军事结构的典型特征始终是强迫它的各个单位进行各种联合行动。犹如士兵的

① 于海：《西方社会思想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50页。

意志事事都以指挥官的意志为转移那样，公民的意志无论是在私人的还是公共的所有事务中，同样要由政府的意志作裁决。军事社会生活所维持的合作，是一种强制性的合作……就像个人有机体的外部器官完全服从于神经中枢那样。^①与此相反，工业类型的社会是建立在志愿合作和个人自我节制的基础上。他认为，工业社会始终是以个人具有同样的自由，包括商业活动的自由为其特征的。社会在多种形式的活动中所进行的合作是一种志愿的合作，就像一个具有发达给养系统的动物获得分散的和非集中化的调节器官那样，有着发达给养系统的社会机体，当它取得了工业类型时，也趋向于借助从众多的阶级当中产生出它的抵抗力量，使其基本的调节器官分散。^②不难看出，在军事型和工业型的社会里，社会结构复杂性程度已经失去了应有的意义，社会内部的调节或管理系统的性质成了注意的中心（当然，斯宾塞这里所说的工业型社会不是指今天意义上的那种工业社会，而是指社会的管理方式或社会的内部关系而言）。

表 1-1 斯宾塞的军事社会与工业社会的比较^③

特 征	军事社会	工业社会
主要功能或活动	为保卫和扩张而进行的共同防御和进攻活动	彼此提供和平的个人服务
社会协调的原则	强制的合作，靠命令形成的严密的组织，对活动的正面和反面的两种管理	自愿的合作，靠契约和正义原则的管理，对活动只有反面管理
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关系	个人为国家的利益而存在，对自由、财产和流动的限制	国家为个人的利益而存在，对自由、财产和流动的限制极少
国家和其他组织之间的关系	全部是公共组织，私人组织受到排斥	私人组织受到鼓励
国家的结构	中央集权制	权利分散
社会分层结构	等级、职业和住地固定不变，地位继承	等级、职业和地位的可变性与开放性，地位之间的流动
经济活动类型	经济自给自足，少量的贸易，贸易保护主义	不再是自给自足的经济，相互依赖的和平贸易，贸易自由
受重视的社会品质和个人品质	爱国主义、勇敢、权威、忠诚、服从，崇拜权威和纪律	独立、尊重他人，反对强制，个人的主动性，诚实、友善

① 贾春增：《外国社会学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3页。

② 贾春增：《外国社会学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3页。

③ 张琢、马福云：《发展社会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2页。